

中外近现代史 专题讲座

主编 王韵华 杨生祥



天津人民出版社

编写说明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上的讲话》中指出：“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干部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按照《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共天津市委党校1993年工作要点的要求，在校委与教务处的支持、指导和帮助下，编写了《中外近现代史专题讲座》一书。这本教材是供市委党校进修班、培训班和理论班使用的，同时，也适于开设本课程的其他班次使用。

教材的编写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进行专题研究。教材中所列专题，均与当今国际经济、政治和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力求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充分发挥

史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教材中所设的10个专题虽涉及中外近现代历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但力求突出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以便适应党校主体班次的教学需要。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人员是:杨生祥(第一、二、三、四讲),王岱英(第五讲)、王韵华(第六、八讲)、解琦(第七、九讲)、任淑艳(第十讲)。全书由王韵华、杨生祥统稿。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史学界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领导、专家学者和出版部门的帮助。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的孙志芳教授在本书编写大纲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宝贵意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陈志远、张义德教授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识见,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同志们指正。

编者 1996年5月

目 录

第一讲 关于近现代中国发展机遇的思考	
一、近现代历史上失之交臂的数次机遇	(2)
二、丧失发展机遇的主要原因	(10)
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历史思考	(17)
第二讲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双重影响	(24)
二、近代中国的资本结构与民族资本主义的衰落	(30)
三、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8)
四、中国传统经济因素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正负效应	(42)
五、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点的思考	(48)
第三讲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与反思	
一、从封闭到开放的艰难历程	(53)
二、言技、言政、言教的深化过程	(62)
三、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与反思	(67)
第四讲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考察	
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78)

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影响	(84)
三、封建主义残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	(94)
四、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与保证	(98)
第五讲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一、深刻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104)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使其为现代化建设增添光彩	(106)
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永恒的魅力	(111)
四、积极地吸纳一切于我有用的外来文化,让传统文化永葆青春	(118)
五、上下合力营造出一种弘扬传统文化的氛围	(121)
第六讲 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	(125)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127)
三、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	(133)
四、曲折反复的资产阶级革命	(137)
五、工业革命和西欧国家的近代化	(142)
第七讲 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改革	
一、“黄金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	(152)
二、世界性经济危机与滞胀的形成	(159)
三、80年代以来的经济调整与改革	(163)

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走向	(169)
第八讲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一、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173)
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181)
三、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	(183)
四、走上改革之路的苏联	(191)
五、80年代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苏联的解体	(197)
第九讲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一、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崛起	(213)
二、东盟国家经济的快速兴起	(223)
三、印度经济的起步和发展	(229)
四、世界瞩目亚洲	(233)
第十讲 走出危机低谷的拉丁美洲	
一、战后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	(237)
二、宏观经济调整、严厉的紧缩政策和措施	(244)
三、经济一体化进程生机勃勃	(257)

第一讲 关于近现代中国发展机遇的思考

所谓机遇,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形成的对于某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难得的有利的机会和境遇。

机遇是客观的,又是相对的,每次机遇延续的时间不会很长。这是由历史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抓住机遇,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机,迅速提高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水平与综合国力。否则,必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落伍甚至被淘汰。对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历史的机遇并非常有,有些是千载难逢的。因此,要善于认识机遇,抓住机遇,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力求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推动国家或民族大踏步的前进。如果面临机遇而漠然置之,不是及时、主动地去把握和利用,也会稍纵即逝。近现代中国曾多次失去振兴和腾飞的机遇,晚清时期,当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波及古老的中国时,由于落后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无法正视外部世界的剧变而调整自身的历史座标,结果造成了中国的百年沉沦。现代史上,我国也曾有丧失机遇的教训。对此,我们应该追根溯源,总结经验,为当今中国“抓住机遇,加快

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近现代历史上失之交臂的数次机遇

在步入近代之前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曾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从16世纪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自15世纪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步入“海洋时代”之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对外经贸交流方面显得过于稳健和保守，缺乏积极的开拓精神。事实上，新的海上贸易开通后，是西方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而不是中国的“西方化”。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1557年）到鸦片战争，在近三百年间，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可以与任何新兴的西方海上殖民势力抗衡。例如，1622年荷兰舰队对澳门的进攻，1624至1662年，荷兰对澎湖和台湾的入侵，均以失败告终。从陆路来犯的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发动的第一次侵略战争中，就被中国击败并订立了城下之约（1680至1689年）。此间，西方势力席卷整个南亚和东南亚，但始终未能踏进中国的南大门。

但是，中国抵挡西方挑战的成功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机遇选择的失误。在新航路开通，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西方商人开始热衷于东方贸易。是时，中国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对东西贸易握有主动权，通过开拓新的远洋贸易，中国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新的贸易大国，并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当时，已通过马尼拉间接开辟了“太平洋的丝绸之路”，即将出现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的态势。然而，中国在世界贸易由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却背道而驰，闭关锁国，采取退缩政策，结果是坐失

良机,将本来有利于经济交流,促进海外贸易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机遇丧失,并将中国商人在南洋开辟的许多贸易基地拱手让与西方商人。这对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和海外贸易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间,对于即将跨入近代门槛的中国来说,又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此时正是西方主要国家已实现社会转型,开始进入近代机器化大生产,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西方国家在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已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政治腐败的中国已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垂涎、覬覦的科皮娅女神。对此,中国的有识之士早有洞察,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多次疾呼,面对“日之将夕”的衰世,“何不思更法?”¹主张清政府要抓住时机,尽早改革,“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²当时,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封建专制统治已走到末世,社会矛盾激化。但中国还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清帝国的人口等于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2倍,国内市场和贸易也远远超过欧洲。整体经济实力依然较为雄厚。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臣不断来华,推动了中外交往的扩大。此时,国内没有大的战乱,周边环境也较为稳定。清政府若能通观世界局势与中国的境况,顺应世界进步潮流,迎接西方国家的经济挑战,自上而下,倾全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治国安邦、振兴经济的经世致用之才,发展经济,加强国防,进而实行政治制度的改良。中国则很可能由此而迅速走出中世纪,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但是,清政府却妄自尊大,闭目塞听。不仅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而且毫无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长期以来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国家,使封建统治者养成了以天朝自居,盲目自大

的心态，他们既不愿了解外部世界，也不愿国内民众去研究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就在清帝宣扬国威自我陶醉之时，却不知一个历史性转折和生死搏斗即将来临。国内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使清廷更关心社会的稳定，担心与外界的广泛接触会导致民夷勾结，从而危及封建专制统治。然而清廷未能意识到，闭关自守已经不能应付外来挑战了，最终是难以维持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的。中国失去了一个主动地进行改革开放，适应世界潮流、避免落后挨打的历史性契机。其结果是中国更加封闭落后，终于使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天朝大国惨遭列强铁蹄的蹂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封建的专制制度，长期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使一个曾经以文明、繁荣著称于世界的东亚大国，一个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民族，在四、五十年间，一落千丈，陷入了历时百余年的屈辱、灾难的深渊，从此便一蹶不振。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间，西方侵略者需要休整并消化所攫取的权益。此时的中外关系出现了一段较为平和的时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仅限于东南沿海四省，尚未深入内地。中国的经济、政治命脉还没有被侵略者完全控制。战后恢复生机，重新崛起的机遇是存在的。外国的侵略与挑战或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巨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遭到拿破仑的入侵，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的失利，日本被美国炮舰轰开国门，都成为各国改革运动的外部动力。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教训，更多的知识分子进一步觉醒，迫切要求清政府抓紧时机进行改革，寻求富国强兵之法，抵御外国侵略势力。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极力

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办近代造船厂和枪炮厂，以求“船坚炮利”。与此同时，早期的改良思想家们还提出了有关经济、政治、军事改革的各种设想。例如，主张允许沿海商民“自愿仿设厂局”，保护民间出洋贸易，民众可自由开发矿藏，建立工厂等等。这时，清政府若能认清形势，接受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抓住时机奋发图强，中国也就不会沉沦下去。但是，早期进步思想家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仅仅是吃了一惊，并没有从失败中接受教训，从而清醒振作和励精图治。《南京条约》的签订反而使他们产生了可以苟安一时的想法，以为英国人“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①他们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而且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视改革兴邦为“多事”，可谓是畛域难化，故习难除。十余年的机遇由此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从国际环境看，这二十年正是世界近代化的第二次浪潮期间，西方列强加速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对中国边疆和周边国家加紧侵略，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边疆危机。在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的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高潮中，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被侵略的危险。从国内形势来看，这二十年是近代史上相对稳定的时期（只有中法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中法战争在局部地区发生）。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同在，时代的发展再一次要求中国抓住时机振作起来，尤其要加快近代经济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对此，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洋务派官员都有程度不同的认识。曾国藩与其亲信幕僚赵烈文在私下的谈话中认为，清王朝的深重危机只有

数十年的挽救时间；李鸿章更是多次指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要求尽快建立近代工矿企业与陆海军。1880年李鸿章在一封要求速购铁甲舰的信中激愤地指出：“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1881年他又高声疾呼：“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¹在诸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推动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洋务运动，在当时被称为“自强新政”或“同光新政”。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倡导强兵固本。从60年代至90年代，创建军工厂和造船厂20余家，创办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企业20多家。花费巨款造船购舰，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水师。设立了同文馆、译书局和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在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又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民族独立的条件下，洋务派主张从长计议，隐忍徐图，先求制人之具，再扬攻人之声，不仅无可非议，倒是较为理智的。这不仅与那些一经失败便心灰意懒，死心踏地的投降派不同，而且与那些闭目塞听，浑浑噩噩，愚昧颡顽，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顽固派，更有天壤之别。当时，与洋务派背道而驰的顽固派却斥责这种变革是“以夷变夏”、“数典忘祖”，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反对洋务派所创办的一切，更反对抓紧时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高速度地发展中国。顽固派官僚刘锡鸿居然说：“绝迹而奔，人喜其捷，而不知有颠陨之虞；缓步而行者，人苦其迟，而不知无倾跌之患”。²由于制度性障碍和顽固势力的阴挠，洋务运动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封建顽固势力的昏聩，使中国的发展机遇再次流逝。1895年，清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又一次败北，《马关条约》的签订，标

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本形成。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也随着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加剧。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虽然不利，但由于甲午战败，赔款之多，割地之大，屈辱之深，灾难之重，激发了全民族的义愤，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在社会上掀起了维新变法潮流。康有为痛陈了中国的危局与维新变法的紧迫性，他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④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他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是时，严复也指出：中国“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⑤1898年中国社会上掀起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给危难中的民族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但是，阶级的局限使维新派幻想依靠徒有其名的光绪皇帝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前途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为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竭力阻挠、破坏和抵制维新变法运动。顽固派公开叫嚷“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甚至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在变法进入高潮时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发动了政变，屠杀维新党人，废除了几乎是全部的维新法令。日本明治维新之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很快便凋谢。危难之中的变革与发展又一次被扼杀和断送了。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维新变法运动的天折，清朝封建统治的极端腐败，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

不断壮大,终于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 267 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也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民众的思想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从此,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帝制永远为中国人民所唾弃,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共和的起点。随着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众兴办实业的各项法令的颁布,各种工商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2 年到 1913 年,全国新设万元以上资本的厂矿达 93 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人们,中国又迎来了一次振兴中华的历史机遇,展现出未来的前途与希望。然而,由于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十分软弱的阶级,他们屈服于内外压力而把革命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中华民国名存实亡。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却置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于不顾,热衷于独裁专制和复辟称帝,将中华民族拖入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深渊。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再次破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40 余年中,在选择和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上,我们有取得巨大成功的自豪,也有令人遗憾的严重失误。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了完成这个过渡,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面临着如何抓住机遇,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和成熟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简单

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的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民主革命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找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47 年中，总起来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29 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 18 年。在前 29 年中，除开始 7 年比较顺利以外，我们在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方面，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失误和挫折。一次发生在以“大跃进”为标志的 1958 年到 1960 年，另一次发生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 1966 年到 1976 年。这两次大的失误都是由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发生严重偏差而造成的。十几年的偏移再加上前后期的影响，长达 20 年左右。此间，西方主要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东移，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带。战后的日本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就是抓住这十几至二十年的时间，加快发展，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可以肯定，如果我们没有重大失误，沿着正确的路线加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及综合国力将大大超过今天。遗憾的是，我们缺乏对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深刻了解，也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经验，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路线使我们走了许多弯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的倾向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所以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表现为浮夸冒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

规律和客观条件,盲目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不对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作客观全面的调查分析,任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左”的错误,在政治上使我们背离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今后中心任务的正确估计,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偏离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经济上,没有经过认真的试验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片面强调人的主观精神方面的作用和搞超越阶段的“穷过渡”,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从1966年到1976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是前十年“左”的错误理论和思想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且损害了党的威信,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经济效益与生产力水平全面下降,使建国以后,经过努力正在逐步缩小的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

二、丧失发展机遇的主要原因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使我们看到,丧失历史机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虽然,每次机遇丧失的原因不尽相同,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但仍可以归纳出一些曾经起过主要或重要作用的原因。

(一)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的落后性、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牢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封闭意识,阻碍着中国了解和走向世界,这是造成我国在近代历史上丧失机遇的主要原

因。中国古老的文明体系曾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却始终没有中断过自身的发展,成为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层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封建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调整和加固,显示出以下特性:其一是长期性。仅在时间上与西欧封建社会比较,中国封建社会差不多比西欧封建社会历史多了一倍的时间。其二是坚韧性。小生产方式是传统农业文明中适应性最强的生产方式。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坚韧性不仅表现在它的高度发达上,还表现在农民具有强大的调节改革社会关系的力量上。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多次周期性爆发的农民起义,冲击和调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不相适应的部分,使中国的小生产方式变得十分坚韧,富于较强的适应性。其三是相对封闭性。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周围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周边国家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低下,加之与世界其它地区交通困难,使得在中国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独树一帜。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止,中国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乃至世界的影响远远超过所受到的影响。由此形成一种“万方来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天朝上国”和“用夏变夷”的至尊自满心理。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这种小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一定的排它性。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是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加之历代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力增大的一种手段,从而缺乏认识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动力。这种既落后,又顽固的封建制度能够长期延续,还在于它得到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积淀深厚的文化系统的支持与加固,中国的封闭政策与封闭意识能在两三百年来岿然不动,恐怕奥秘就在于此。